典籍翻译与中国的版本之学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and the Study of Chinese Bibliology

潘文国
PAN Wenguo

摘要:

本文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中国的版本目录学。简要介绍中国传统的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的知识。二、典籍翻译中的版本问题。从版本学的角度看翻译，把以往的典籍翻译分为三类：译人型翻译、文人型翻译和学人型翻译，分别进行讨论。三、典籍翻译与版本问题的思考。主要谈从典籍翻译与版本学关系引起对当前如何从事典籍翻译的一些思考。

关键词:

典籍翻译；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

Abstract:

The paper deals with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and the study of traditional bibliology. It first gives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three related traditional disciplines of bibliology, bibliography and textual emendation. Then it discusses the issues of different versions in translation of classics, and divides the translators of the enterprise into three types, literary translators, literature translators and scholastic translators. Finally it talks about the significance of biographical study in today's translation of classics.

Kew words: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bibliology; bibliography; textual emendation study

把典籍翻译与版本目录学联系在一起，这是个新鲜题目。但是考虑到两者的关系，可以说这本来就应该是题中之义，只是因为我们自己关心不够而把它冷落了。在积极推进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今天，这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重新重视。下面从三个方面来谈。

1. 中国的版本目录学

版本学是中国一门传统学问，谈到版本，必谈目录，也必谈校勘，这可以说是

一而三、三而一的题目。它的宗旨是帮助人们解决一个读书的门径问题。目录学是帮人找到书，版本学是怎么找到好的书，校勘学是在前两者基础上自己动手，制成一本“善本”或适用的书。对古人来说，找到一本好书是读书的开始。对于翻译来讲，拥有一个好的底本是成功翻译的基础。顺着三者顺序，我们从目录学说起。

1.1 目录学

很多人可能认为目录学只是图书馆采编人员需要学习的东西，其实不然。对于一家图书馆来说，目录反映的也许只是该馆的藏书情况，但对整个国家来说，图书总目及其编排归类反映的却是这个国家文化的整体结构以及社会对文化的总体认知。当今国家的图书目录分类法是如此，传统的学术目录也是如此。如《四库全书》就反映了到清代为止我们国家的整体学术架构。不了解图书总体目录就会缺少全局观，这对学术研究尤其是文科的学术研究是十分不利的。因此文科学生进大学的第一天，都会被领去听取关于本校图书资料和使用情况的介绍。但现在好像越来越多的人较少利用图书馆资料了，而是想到什么就上网查。这样做有利有弊。但就古籍而言，这一步还是不可缺少的。清代史学家王鸣盛说：“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十七史商榷》卷七）。目录是读书的第一步，也是译书的第一步。

中国是世界上图书分目成熟最早的国家。“目录”一词出于西汉刘向（前 77—前 6）的《别录》，这比西方第一个文献目录、瑞士盖士纳（Conrad Gessner, 1516—1565）的《万国书库》（*Bibliotheca Universalis*, 1545 年出版，该书据说收集了当时用希腊语、拉丁语和希伯来语出版的全部书籍）要早 1500 多年。刘向、刘歆（前 53—后 23）父子完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图书分类。刘向著《别录》，刘歆补成《七略》，著录图书 603 家，13219 卷，分为六大部、38 类，每类之后有类序，每部之后有部序。所谓的“目”就是篇名，所谓的“录”就是序记。因此他开创了一个传统，就是图书的分类都有目有录，一直到《四库全书》还是如此，在《四库全书》编完之后，纪昀等人撰写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提要”也就是“录”。现在的图书馆大约书实在太多，这方面就不如古人，往往有“目”无“录”。其实“录”对图书的利用非常重要。我们现在读古书，还会常常利用《四库全书总目》的提要，因为这体现了这本书的基本内容和传统对这本书的基本评价。

古代的目录学著作非常之多，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国家编的；二是史志编的；三是私人编的。国家编的例如刘向父子的《七略》和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志编的包括两部分，一是正史里“志”的内容，最早是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和魏征的《隋书·经籍志》，以后各代正史都有，如《宋史·艺文志》。另

一部分是别史如南宋郑樵（1104—1162）编的《通志·艺文略》、元人马端临（1254—1323）编的《文献通考·经籍考》等。私人编的最重要的有南宋晁公武（1105—1180）的《郡斋读书志》和陈振孙（1186—1262）的《直斋书录解题》。这些书中，最重要的是“二志一目”，即《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和《四库全书总目》。刘氏父子提出“六略”的分类法（《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晋人荀勖提出四部分类，他叫作“甲、乙、丙、丁”，唐代魏征在《隋书·经籍志》里接受了这一分类，并正式采用“经史子集”名称，之后，四部分类法在中国沿用了1400多年，反映了中国人对中国文化的基本认识，也是所谓“国学”的根本架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共200卷，分经史子集四部，“经部”分易、书、诗、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共10类；“史部”分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共15类；“子部”分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释家、道家共14类；“集部”分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共5类，合计44类，有66个子目。这可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总纲（如“目录学”就是“子部”的“谱录”类“书目”小类）。

目录学的功用，清代学者章学诚归结为八个字，即“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前一句就是对学科进行分类；后一句就是对学术形成发展的来龙去脉进行梳理。从《汉书·艺文志》辨析“九家十流”，对汉代以前的思想发展源流梳理得清清楚楚开始，这些“目”“录”是历来治学的门径。我们今天要深入了解传统典籍的内容，目录学绝对是最好的切入口。

当然由于历史的发展，有的典籍遗失了，而有的内容增加了。比较“两志一目”，我们可以知道这些书的流失过程，同时也可以看到学术的发展过程。如在“汉志”里，史部还没有独立，因为那时还没有几本历史书（《史记》是归在“春秋”类里的），到了“隋志”里就有了。“词曲”是唐以后产生的，“隋志”里不可能有，要到“四库”里才收入。而“小说、戏剧类”在古代不受重视，“四库”不收，要到“四库”以后的目录家才会收入。“四库”以后的目录，最重要的是晚清洋务派领袖张之洞的《书目答问》（1875年）（有范希曾的《书目答问补正》，1931年）。此外有一些丛书。就古籍而言，最重要的有：（1）商务印书馆张元济《四部丛刊目录》，1919—1925年出了三编，收书504种，3134册；（2）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主持的《丛书集成》（1935—1937），收丛书100种，书4000多册；（3）中华书局编《中国丛书综录》（1959—1962），收书38891种。除了《丛书集成》采用了“四库”的提要之外，其余的都有目无录。但好处是，这些都是现在可以见得到的古书。

网络的发达,使我们现在找书更方便了,往往输入一个书名,在网上就可以找到。这有利有弊,利是主要的。弊是网上资料水平参差不齐,如果贪图省时,有时会以讹传讹。比如某人引用了一本古书叫《吕氏年龄》,上网以后,不胫而走,引用者一万多条,搞得人们不知真假,其实只是上传者输错了《吕氏春秋》而已。因此即使要利用网络,至少要引用可靠的影印本。

1.2 版本学

版本 (version) 指同一本书的不同呈现形式。但版本问题要复杂得多。版字从“片”,是“木”的一半,与木板有关,是刻版印刷以后的产物,但典籍在刻版以前就有了,因此广义的版本包括书籍的所有呈现方式。对典籍来说,主要有四种:(1) 手抄本;(2) 金石本;(3) 刻印本;(4) 电子本。而每种又有许多形式,简述如下:

(1) 手抄本。唐以前的书都是手抄的,甚至唐以后,由于书籍还是一件比较奢侈的东西,买不起书,或者买不到书,还是只有抄书一法。抄书的材料也经过了几度变化。最早是甲骨,后来是竹木和丝帛,东汉以后发明了纸,使得抄写变得大为方便。抄本的最大缺点是不能复制,抄一份只有一份,因此如果能够流传下来那是极其珍贵的。由于抄写费时、不易,因此抄写的人和有幸得到的人都非常珍视,读书的人也特别用功。不比到后来雕版时代,书容易得到了,人们反而不认真读书了。苏东坡曾经很感慨地说:

自孔子圣人,其学必始于观书。当是时,惟周之柱下史老聃为多书。韩宣子适鲁,然后见《易用象》与《鲁春秋》。季札聘于上国,然后得闻《诗》之风雅颂。而楚独有左右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士之生于是时,得其《六经》者盖无几,其学可谓难矣。而皆习于礼乐,深于道德,非后世君子所及。自秦汉以来,作者益众,纸与字画日趋于简便,而书益多,士莫不有,然学者益以苟简,何哉?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自手书,日夜诵读,唯恐不及。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转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词学术,当倍蓰于昔人,而后生科举之士,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此又何也?
(苏轼 1986: 358)

记得我小时候读唐诗,就是采取抄的办法。现在科技这么发达,再这样做的人是不可能有了。抄本使人认真,但不足是显然的,不易复制,容易遗失。更重要的是,从版本的角度看,再认真的抄写者,鲁鱼亥豕,也在所难免。特别是书籍传抄,

转经多手，错误只会越来越多。另外，从作者的角度看，同一篇文章，每重抄一次，也会随时作些小改动，因此才会一篇文章有四稿、五稿。譬如《红楼梦》有那么多手稿版本，很多是曹雪芹在写作过程中自己的改动。

(2) 金石本。这是采用自然界历时最能长久的载体来保存文本，可见主事者对其的重视程度。金本可以上溯到商周钟鼎文，而石本则以不晚于秦始皇时期的石鼓文为最古，其次是李斯的峯山刻石。金石本有的长达数百字，如石鼓文收诗十首，长达 712 字。最长的青铜器铭文、周宣王（前 827—前 781）时的《毛公鼎》，铭字达 499 字。秦汉以后也有很多的碑铭，但一般版本学家讲石本，通常从“熹平石经”讲起，因为上述都是单篇作品，而石经是以著作的范本形式出现的。最有名的有两种，一种是东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 175 年）蔡邕等奏请正定《六经》文字，由他亲自书丹，令刻工镌刻，每碑高一丈宽四尺，共 73 碑，20 万 911 字。因只有隶书一种字体，故亦称《一字石经》。另一种是魏国齐王芳正始二年（241 年）刻的《三字石经》，用古、篆、隶三体文字，有 75 碑。

金石本的使用方法有二，一仍然是手抄。据《后汉书·蔡邕传》记载，《一字石经》刚立在太学门的时候，“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二是碑拓，这是石本和造纸术发明共同催生的一门技术，大概产生于南北朝，因为齐梁宫中就有《一字石经》《三字石经》的拓本。也亏得这一技术的产生，这才保留了古本的很多材料。因为原来以为金、石都是重器，可以保存久远，没想到这些东西由于目标大，被破坏得更快。《一字石经》到了唐初，已经“十去其九”，唯有拓本尚存，到乾隆时，连拓本也只剩 127 字了。《三字石经》自晋后即开始残缺，迄今各处所存拓本字加起来也仅 2000 左右。后来唐宋时都曾刻过石经，但都没有留下来。但拓碑的技术却促进了刻印版本的产生。

从版本学的角度看，就刻石或铸金过程的郑重其事，其本身质量当然是无可挑剔的。但留下来的数量实在太少，文献意义有限，后世人们更重视的只是其书法上的价值。

(3) 刻印本。印刷术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它的产生发展也经历了很长时间。其产生有两个来源，一是中国固有的玺印传统；二是南北朝产生的碑拓技术。镂板技术肇始于南北朝，最初大约是道教用来刻符篆，后来佛教用来刻佛像，逐渐加进了文字。由印佛像进而印佛经。现存最早的印刷品实物是敦煌发现、现存大英博物馆的《金刚经》，刻于唐懿宗咸通九年（公元 868 年），刻印的成熟当然比这要早。由宗教而历书，而字书，五代以后，印刷术被用于刻印儒家典籍。

刻印本的发展也经历了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雕版印刷，即在整块版上雕刻图

画或文字。这也是“版本”一词之由来。第二阶段是活字印刷。据北宋沈括(1031—1095)《梦溪笔谈》所记,发明者是布衣毕昇。活字又有泥活字、木活字、铜活字等的区别。宋时用泥活字,元时用木活字,铜活字或云宋代已有。至清代印《古今图书集成》用铜活字。后因铜字毁,改用木活字,以其名不雅驯,改称武英殿聚珍版。第三阶段是清末从西方引进石印及影印之法。第四阶段则是20世纪80年代王选发明的激光照排技术,因此他被称为“当代毕昇”。

刻印本的出现造成了书籍的大普及,出版、收藏和阅读都变得方便了。但在版本上也产生了一些新问题。一是书由不同时期、不同人出版,其间有差异;二是同一作者不同时期出版,文字有差异;三是刻工水平有高低,其间有差异;四是校读者水平有高低,造成差异;五是热门书有盗版,质量参差不齐;六是刻版书与作者幸存手稿相比有差异;七是进入20世纪以后,新排印的书与原书因体例等造成差异;八是因增加新式标点造成断句、标点的差异;九是因异体字规范造成的差异;十是转成简化字后因繁简不对应造成的差异。在20世纪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大量古籍以及竹简帛书,其与历代通行本之间也有着很大的差异。也就是说,在抄本、石本时代,数量有限,版本不同问题还不甚突出;到了印本时代,版本问题越来越成为一个需要专门对付的问题。因此知道要读什么书之后,读什么版本的书也成了一个大问题。这时,像张之洞的《书目答问》之类的书就帮了大忙,它会告诉你读同一部书,哪一种版本最好,好在哪里。

(4) 电子本。科学技术的发展又催生了第四种版本形态。这就是以电子为载体的电子版。电子版有两种,一种是人工输入的,一种是扫描输入的,后一种相当于纸媒时代的影印本。电子版的出现,大大降低了出版书籍和获得书籍的成本,也使得以前为各大图书馆珍藏的稀见版本有可能进入寻常家,从而大大提高了书籍的获得率和利用率。然而正如纸张发明、版本普及带来了读书效率反而降低的情况,随着书籍出版和获得的方便,电子书的粗制滥造现象比纸质版更加严重,特别是一些书由于缺少严格的审校,质量令人担忧。有些使用者不喜欢看扫描版特别是繁体或直排的原版,而喜欢人工处理过的txt或doc版,错误率就更高了。

综上所述,由于时代的变迁和科技的发展,现在的版本问题比以前更复杂了。原来比如我们看到张之洞《书目答问》推荐的版本或者有其他渠道得知的好的版本,我们愁的是借不到、买不到甚至无处可借(《中国丛书综录》会告诉我们某些版本在国内什么图书馆)。现在很多书都能从网上得到,却是由于自己的原因不肯用好的版本,这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

1.3 校雠学

张之洞说：“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书目答问略例》）。“找好书”有一个标准，就是张之洞说的“精校精注本”。“精校精注本”哪里来？就涉及另一门重要的学问：校雠学。“校雠”这个词首见于西汉刘向的《别录》，“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冤家相对，为雠”。简单说，“校”是一人独校，“雠”是二人对校。与之相关的，还有“校勘”一词，产生于南北朝，如《北史·崔光传》中有“光乃令国子博士李郁与助教韩神国、刘燮等校勘石经”。现代常见的还有“校对”一词，出版社里有人专司其职。现在这些词已经有了明确分工：“校雠学”指总体，不仅包含了传统的目录学、版本学和校勘学的内容，甚至包括“考证”“辑佚”“辨伪”“注释”等这些古籍整理的全部工作，而“校勘学”指对同一本书的不同版本，互相校对，比较其文字的异同。这两个词都用于古籍整理，而“校对”则指现代图书报刊出版的一个环节，根据原稿核对校样，以确保出版物的质量。广义的校雠学包括了古籍整理的整个过程：收齐各种版本（版本学）；比对文字（校勘学）；分门别类、理清源流（目录学）。校勘是其中一个重要环节。

校勘的工作可分三步：

（1）存真。每得一个新的、特别是稀见版本，拿各种通行本作对照，来说明其面貌。细节包括版式、行款、用笔或书法特点、载体材质等，都要一一记录在案。以体现原本之“真”。

（2）列异。对于已有书籍来说，确定以一个通行本为底本，比较各种版本，所有的差异都要一一记录在案，以备研究作参考。

（3）正讹。面对不同版本各种差异，结合整理者的历史、文化知识，判断何者为正、何者为讹，最终拿出一个定本。

三者之中，第三步最难。前两步还只要求细心，不要放过疑点和细节；第三步则要求有判断力，这是一个人的个人学养、学识的综合体现，是对整理者的极高要求。

校勘的内容主要集中在文字上，前人总结出有这么一些：误文、脱文、脱简、衍文、重出、错简、颠倒、舛入、妄增、妄删、误改、避讳、恶改（如《四库》本对古书有许多恶意修改）等，这里就不细说了。

2. 典籍翻译中的版本问题

以上谈的是传统文献学中版本目录学的简单介绍。从事典籍翻译的人对于这些东西，有人知道，有人可能从没听说过，也有人可能是不自觉地在这样做。现在我

们提出这个问题,是希望变无知为有知,变无意识为有意识,变不自觉为自觉的行为,以更好地提高典籍翻译的质量。首先我们要来回顾一下前人在这方面的处理情况,以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我认为,从版本学的角度看,可以把以往的典籍翻译分为三类。一类叫译人型翻译,一类叫文人型翻译,还有一类叫学人型翻译。

2.1 译人型翻译

这是纯粹从文字转换的角度去做典籍翻译,不强调版本,甚至不说明版本。如当代典籍翻译做得最多的许渊冲先生与汪榕培先生。他们翻译的量很大,但相对来说,对版本问题关心不够;如果说有的话,他们更关心的是译文的版本,同一部作品,有过多少种外文翻译,某一文种,又有多少人做过翻译。

这种情况与典籍翻译发展的历史有关。这两位可说是我国当代典籍翻译最早起步的拓荒者。其时还缺少“典籍”的意识,翻译又是从文学作品开始的(许先生的唐诗、汪先生的陶诗),而且是选译多于全译。到了许先生译《诗经》《楚辞》、汪先生译《易经》、戏曲的时候,他们可能已经有了典籍翻译的意识,但更多的还是想提供一个比前人更好的译本。翻译方面的考虑要多于文本方面的考虑。

由于这两位是国内典籍翻译界的领军人物,其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因此中国当代的典籍翻译者走的大多是这一条路子。当然,这跟我们的翻译者大多出身外语系、缺少古籍方面的修养也有关系。

而在国外,有不少的中国作品翻译者是出于好奇甚至猎艳的心态,对中国文化的总体及其特点更是不可能了解。为翻译而翻译、就翻译论翻译的情况比较普遍。

2.2 文人型翻译

其实许先生、汪先生他们也是文人型翻译。他们把诗歌、戏剧等的翻译更多地看作是文学作品的翻译。中国现当代的翻译是从文学翻译起步的,林纾、周桂笙等译者的翻译作品,对后人影响很大。甚至翻译理论也是如此,严复没有做过一天文学翻译,但围绕“信达雅”的讨论始终在文学翻译的范围内进行。国外大约也是如此,从古代一直到20世纪中叶都是从事文学翻译和讨论文学翻译的天下。文学翻译只讲情节的感人、语言的优美生动,能吸引读者的眼球。为达到目的,改编、改写的情況也不少见。说到这里,大家可能猜到我要举谁作例子了。没错,就是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和霍克思(David Hawkes)。葛浩文翻译的主要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这些作品的版本问题即使在中国也不太受人关注。人们关注的是葛浩文在翻译中的大胆,他不但在具体的文字处理中敢于用自己的笔来叙述他人的故事,而且为了适应西方读者的需要,甚至会改动小说的情节和结尾(当然这种做法是跟编辑和原作

者商量并得到认可的)。这种翻译方法对中国译者可说是见所未见,大开眼界。

霍克思的例子更典型。与上述几位不同,作为著名的汉学家,霍克思对中国的版本学是熟悉的,他所面对的又是版本情况特别复杂、以至不谈版本根本没法进行翻译的《红楼梦》。对“红学”略有所知的人都知道,《红楼梦》有“80回本脂评《石头记》”和“120回本程、高版《红楼梦》”两大系列。前者有“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戚蓼生序本、蒙古王府本、列藏本、靖本”等不同版本,后者有“程甲本、程乙本、梦稿本、郑藏本、舒序本、梦觉本”等不同版本,尽管许多都是残卷,但内容、文字之不同是非常明显的。在霍译 *The Story of the Stone* 第1卷的序言里他提到了上述几乎所有版本,并比较了它们的不同,说明他见过并拥有这些版本,这是进行版本研究的前提。但他最终却采取了“从程乙本出发,顺着某一版本翻译,时而又转入另一版本,时而又加上自己的修正”的策略,结果造成了“属于他自己的一个版本”。最有意思的是序中他写的最后一段话:“For although this, in the sense I have already indicated, an ‘unfinished’ novel, it was written (and rewritten) by a great artist with his very lifeblood. I have therefore assumed that whatever I find in it is there for a purpose and must be dealt with somehow or other. I cannot pretend always to have done so successfully, but if I can convey to the reader even a fraction of the pleasure this Chinese novel has given me, I shall not have lived in vain” (Hawkes 1973: 46)。在第2卷的序言里他说得更明白:“For the benefit of the learned reader I ought perhaps to explain that this translation in fact represents a new edition of my own. For reasons which I shall endeavour to make clear, I do not think it is possible for a modern translator to follow any of the existing versions without deviating from it occasionally” (Hawkes 1973: 18)。他强调曹雪芹是以生命在写作,而他是以生命在翻译,可见在他心底,他作为文学家的责任已经远远超过他作为翻译家,更不用说作为版本学家的责任了。

2.3 学人型翻译

历史上有过许多学人型翻译。最典型的是理雅各 (James Legge), 他的 *The Chinese Classics* 可以说是学者型翻译的经典。又如翟林奈 (Lionel Giles) 翻译的 *Sun Tzū on the Art of War* (Giles 1910) 也是一个文献学家翻译的典型。该书的序言可说就是《孙子兵法》研究的一篇专题论文,对其历史与版本作了非常详尽的考察。在译文中他列出并讨论了许多异文,可惜湖南出版社1993年引进出版此书时把这些极有文献价值的注释和讨论全部删去了。其实英译中时也有学者型的翻译,典型的如梁实秋先生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本来西方的版本学没有中国那样发达,但莎氏研究是个例外。从 W. J. Craig 编的 *The Complete Works of William Shakespeare* (W. J.

Craig 1984) 的前言里可见一斑: 莎氏生前只有 15 种剧本出过小四开本, 是从剧院中偷偷拿来的, 未经作者同意。1616 年莎士比亚去世时至少有 22 种剧本只有手稿。1823 年, John Heming 和 Henry Condell 才把他已出版和未出版的剧本共 36 种合在一起出了第一个对开本。第 37 种 *Pericles* 是 1630 年单独出版的, 1644 年对开本第三次印刷时把它加了进去。这就是他工作的底本。由于剧本是剧院提供的, 里面有很多演员随意加的东西, 加之那时对印刷品质量不重视, 错误极多。他做了很多订正工作。其间还参考了 Theobald (1733)、Capell (1768) 等人的本子。中国的莎译家一是朱生豪, 一是梁实秋。前者可说是文人之译, 而后者就是学人之译的代表, 其中梁先生对每一个剧本的版本情况都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如《利查三世》就提到“第一四开本、第二四开本、第三四开本、第四四开本、第五四开本、第六四开本、第一对折本”, 并分别说明这些版本间的不同。这在以前的外译中作品中很少见到。学人型翻译往往为文人型翻译所不喜, 如霍克思就说过: “...though footnotes are all very well in their place, reading a heavily annotated novel would seem to me rather like trying to play tennis in chains” (Hawkes 1977: 18)。

不过这里我们要特别介绍的是距我们最近的一部翻译作品, 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 (Stephen Owen) 2016 年刚刚出版的 *The Poetry of Du Fu* (Owen 2016)。这是一部完美体现版本家古籍英译的杰作。他几乎是完全沿着我们上面讲的三部曲进行的: (1) 存真。他在本书前言里专门安排了一节谈杜诗的版本问题, 从杜甫死后不久樊晃搜集的 290 首《杜甫小集》开始, 到清代的十余种收有杜诗的重要本子, 这些本子间的相互关系、优点和缺点, 一直到本书完成前一年出版的萧涤非的《杜甫全集校注》。在他实际注译过程中, 他引用的杜诗版本有 30 多种, 基本可说是无美不具。更难能可贵的是, 他对所译的 1405 首杜诗每首都注明了在不同版本中的卷次 (最基本的是《全唐诗》本、《文苑英华》本、《唐文粹》本、《宋本杜工部集》本、宋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本、仇兆鳌《杜诗详注》本、陈贻焮《杜甫评传》本、萧涤非《杜甫全集校注》本等)。(2) 列异。他以补充注释 (additional notes) 的方式列出了诗的各种异文, 主要是早期宋本 (如《文苑英华》本、《宋本》《郭知达本》等) 与后来诸家的不同。(3) 正讹。由于译文最终只能有一种选择, 译者最后必须在诸家异文中作出决断, 选取其中之一。这方面我发现宇文有一点犹豫, 他在比较了各种本子以后, 认为早期宋本比以后的各家本子要好, 但为了翻译的方便, 他采用了最常见的仇兆鳌本作为底本, 卷数、次序均以其为主。在翻译遇到仇本与宋初诸本有异文时, 在不影响文义情况下他仍会采用仇本; 但如影响文义, 他常会舍仇就宋。